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黄俊杰 主编

郑吉雄 张宝三 编

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初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黄俊杰 主编

郑吉雄 张宝三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亚传世汉籍文献献译解方法初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初探/郑吉雄、张宝三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7-5926-4

I. 东… II. ①郑…②张… III. 中文—古籍—翻译—研究—东亚
IV. H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1503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初探》, 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134 号

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初探

编 者 郑吉雄 张宝三

项目编辑 钟明奇

文字编辑 关艳丽

责任校对 海 明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插 页 2

印 张 16.5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次

印 数 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926-4/B·410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将近十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两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为“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七十余种(仍在陆续出版中),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

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我们希望在21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将近十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相信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未来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黄俊傑 谨识

2007年4月13日

于台北台湾大学

导 言

郑吉雄*

自2003年7月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2—2005)东亚文献研究室开始推动一连串学术活动,将东亚文献的研究,朝向整合性、理论性、脉络性等三个方向推进,并强调纵深化的议题与国际性的合作,遂有2003年12月11、12日的“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这部论集,是在该次会议的论文中,择优辑录,既作为本中心现阶段强调整合交流的研究成果,也希望对于当代东亚文献研究,能够产生若干推动与转化的作用。

衡诸世界各文明系统演进的通则,文献的累积,系文明发展的重要指标。探讨文献研究方法之相关问题,也是知识分子反省文明进程的重要工作。中国奕世相传,并流播至韩国、日本、越南等地,而发生影响的重要经典文献,数量极多。而其流播过程,中、日、韩、越各地学者均依其历史文化背景的特性,按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翻译、诠释,而形成各不相同的方法与传统。事实上,传世汉籍文献在世界各国翻译与注释的历程,也反映了东亚文明在东西方流传播迁的历史。这部书所收的各篇论文,分别从不同

*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同的视角切入观察汉籍译解方法的相关问题。以下我将一一简略说明各篇撰著重点,最后综合讨论,剖析义蕴,说明本书编辑旨趣所在。

二

康达维教授(Professor David R. Knechtges)的论文是研讨会主题演讲的讲稿,也是本书唯一收录的英文论文。作者首先特别提揭“perils”和“pleasures”两字,说明翻译工作看似轻松,但其实极为严肃;虽则危险,又同时充满乐趣的交错情形。作者首先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而已,而且是译者引导读者放弃自身原有的语言习惯,进入原典原文作者的文化和语言世界。因此,翻译绝不是技术性的工作,而是与原典的学术地位相同的高层次学术工作。

作者接着透过分析欧洲汉学家翻译中国经典的历史,说明转译经典背后的种种繁复的问题。作者指出,欧美翻译者往往是根据他们所理解的东方文化与宗教作为评判准则,来决定选择哪些中国经典进行翻译,并因此而创造了新的“经典”,但这却不一定能反映该经典所源出的传统和文化价值。例如早期耶稣会士受其宗教关怀的影响,因此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四书》。他们认为《四书》是中国宗教传统的核心经典。而《易经》的翻译者也有近似的情况。例如 Fr. Joachim Bouvet(白晋,1656—1730)认为《易经》是将世界一切现象化约为量化的度量衡单位的一把钥匙。而一旦西方汉学家进行翻译,即面对了经典的不稳定性:一方面是原典原义本来就很难完整重现,而在经典流传的千百年历程中,不同的版本彼此同异互见,不同的学者又作出各不相同的注解,更大大提高了这种不稳定性。在中国众多的经典中,以《易经》为尤甚。因为《易经》成为一个确定的文本,是迟至3世纪的事。而《易经》中的许多文字的歧异性和内容的多重性所产生的问题,甚至近年有了新的出土文献作为参照,亦无法完全解决。作者认为,应付的办法之一,是选一个特定的注疏来翻译《周易》,像是 Philastre 的法文本就是根据程颐

(正叔、伊川,1033—1107)和朱熹(元晦、晦庵,1130—1200)的意见,或是 Richard Lynn 遵循王弼(辅嗣,226—249)《注》的翻译。但总而言之,翻译者必须在这方面保持高度的警觉。

面对同一部《易经》解释传统,西方不同语系的译者虽然存在重大的分歧,但他们的基本目标始终是希望找到一个“原来的《易经》”。当然他们都承继了高亨(1900—1986)、李镜池(1902—1975)等古史辨学者的研究成果。像 Edward L. Shaughnessy、Richard Alan Kunst 和 Richard Rutt 都能区别经传,直接研究西周初年的卦爻辞的意义。三位学者之中,只有 Richard Rutt 出版了他的翻译。不过这些想重现原典的学者有时也有其限制,不能透过比较原典的内容来获得原义。作者指出,过去多位汉学家释“遁”卦为“豚”,却没有引用到一项证据,即“中孚”卦“豚鱼”二字,在汉晋时期就有学者写作“遁鱼”。像这样的例证是不应被忽略的。作者认为,翻译工作必须至少提升到这样的层次。最后,作者指出,翻译其实等于另一种注解,一方面译者应该觉察到所选的版本限制,另一方面译文本身也需要另加注释。事实上,作者自己从事《文选》翻译时就加入了数量庞大的注释。他认为翻译工作的真正乐趣,就在于检验证据,发掘每一个细节可能有的意义,然后在批注中以清晰的辩证支持其论断。如此翻译虽然很慢,但良善的翻译正是一门缓缓移译、慢慢咀嚼每字每句的艺术。

康教授深度与张力兼具的论文,为这次研讨会揭开了重要的序幕,也在技术层次与理论层次两方面给予与会者重要的启示。如果我们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的区域,那么本书所收的各篇论文,事实上涉及此一区域文献译解三个方面的问题——文献批注的型态与性质问题,文献诠释的思维与方法问题,文献译注的语言制约问题。以下分别说明。

三

关于“文献批注的型态与性质问题”,是指中国传统学者批注文献,在方

法上具有何种特殊性的问题。这方面,本书收录了张以仁师《从温词〈归国遥〉“小凤战篴金飏艳”句五家注的讨论谈到注解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张素卿《“评点”的解释类型——从儒者标抹读经到经书评点的侧面考察》和庄雅州《论考释〈尔雅〉草木虫鱼鸟兽之方法》三篇论文。张师的论文针对温庭筠(飞卿,约812—约870)《归国遥》词“小凤战篴金飏艳”句,仔细商榷华连圃等五家注解,审音辨义,详作分析与讨论,确定正解。并且以此为基础,透过检讨五家注语文方面的错失,以呈显训诂的步骤与方法之重要,从而提出慎读原典、详酌旧说、覆按资料、印证同例、提供理据等步骤,及稽之旧训有据、揆之本文而协、验之全词亦通、求之他例可证、按之音律能谐等检验方法,以期建立学术性的注解方式。本文并非2003年12月译解方法研讨会的论文,且经已在《史语所集刊》发表^①,因为这篇文章直接触及注解方法与态度问题,在方向与范畴两方面完全与本书各篇主题吻合,因此特别向作者情商,收录在本书之中。

张素卿的论文认为,“评点”可说是与经典“注疏”传统相应的一种小传统。评点起源于阅读,与儒者之读经、解经有密切的渊源。从南宋到清代,评点《四书》和群经的著作愈来愈多。作者也比较了“注疏”和“评点”的同与异:“注疏”始于离析经文、断句分章;“评点”则划分段落,分析文本的离合。两者都不免以区断文本入手,以阐发经典之义为旨归。然而“注疏”凭借训诂方法以通古今言语,“评点”则主要关注本文脉络,运用圈点抹画等标示符号进行分析、赏鉴,并与夹注、尾评等语言文字之评论,相互映发。不过作者也指出,虽然“评点”可以被视为经典延续和流行的一个历程,但亦未为理想。

庄雅州的论文讨论了考释《尔雅》末七篇^②的方法和态度,提出“因声求义”、“比较互证”等共九种考释方法。作者特别提出《尔雅》内容的复杂性、文字的简略性和注解的分歧性,强调兼采各法,不宜偏废。各种考释方法的效用亦各有所偏,研究者也必须充分运用新知,谨慎从事。尤其重要的是对

①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2004年9月,页423-443。

② 即《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

于无法考证以及难以定论的地方,必须存疑付阙。综而言之,“评点”作为一种新型态的“准注释”文献,既有别于正统的注疏,但又能补充注疏的不足。至于《尔雅》一书,本身就是极具特殊性的解经的文献,却因为内容简约艰深,常常被研究经典诠释的学者所忽略,十分可惜。而庄教授的研究,也就显得更弥足珍贵了。

四

关于“文献诠释的思维与方法问题”,是指诠释经典的文献所关涉的思维与观念以及思想史的相关问题。这方面本书收录了李焯然《越南狂士黎文敏〈大学〉对〈大学〉的诠释》、林忠军《试论汉儒以象解〈易〉方法》和何俊《晚宋儒学的转型与解经方法的变化》共三篇论文。李焯然的论文简述越南儒学的历史概况。如我们所知,越南一向被视为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从陈朝(1225—1400)便已以中国的制度为依据,在数百年间深受中国官方提倡的程朱学说影响,对儒学的探究,与日本、朝鲜比较起来,创获较少,学者的著作亦不多。作者特别讨论了阮朝(1802—1945)时代自号“狂士”的儒生黎文敏(应和,约1859—1935)的注经思想。黎氏对《大学》的理解和诠释,以“知本”为核心,以“伦常之道”和“阴阳之道”来解释《大学》,一方面深受《易》学、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西方自由主义和科学思想。这反映了越南学者在西学冲击的过程中对传统经典的新诠释。越南儒学一般较为东亚学者所忽略。本文无疑让读者得以透过一个实际的案例,一窥越南儒学特质的一隅。

林忠军的论文在方法和方法论两个层次上,讨论了以象解《易》的问题。作者认为八卦和六十四卦本身即系一种形象符号,突破了文字语言的局限。以象解《易》的方法始于春秋时期,而大量被《易传》尤其是《说卦传》运用。其后汉儒用“以象生象”和“象外生象”的方法,使以象解《易》之法,更为缜密。汉儒同时参用了以数解《易》和以象解《易》相辅而行,透过训诂和各种

严密的验证之法,对于象数《易》学的传统作出了新的贡献。本文也同时提示了象数论《易》的限制,并分析了以象解《易》之法式微的原因,充分显示了作者具有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事实上,义理论《易》和象数论《易》各有其方法论背景,两种诠释理论都各有其预设和限制,很难说哪一种绝对有效。尤其注释像《易经》这样具有高度抽象理论思维的文献,任何研究者在提出诠释理论时,都必须保持警觉,谨慎从事。

何俊的论文借由解释“思想”与“学术”之间的关系,说明晚宋儒学本身已发展出清代考证学的必然性。作者提出了一个学术(文献考据)与思想(哲理阐发)发展的解释模式,认为学术支撑了思想,而思想则引导了学术。当思想向学术转型时,思想本身会因为学术的展开而发生变化;而作为思想支撑的学术一旦被修改,思想也等于被解构。作者认为南宋以朱子学为主流,朱学在浙江的传播主要是由“义理阐释”过渡为“经史考辨”。尤其王应麟(伯厚、深宁,1223—1296)与黄震(东发,1213—1281)的论著已具备思想转型为学术范式的性质,与清初治考证大师的论著极为相似,既影响到朱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型,也促进了清初学术的形成。考证方法的凸显,说明了宋学在朱熹思想成为正统以后,便有着转型的内在需要,亦即说儒者在理解与阐释思想时,由思想的关注转向对思想的“表述方式”的关注,由是考证学也成为摆脱空疏无本的思想论说的重要而有效途径。何俊的论文分析相当细腻。当然,关于清代思潮的典范性是否从南宋理学内部发展出来,是一个仍具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何俊提出的解释模式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五

关于“文献译注的语言制约问题”,涉及的是东亚地区不同国家之学者在翻译、解释中国传世文献时,受到语言的制约,而产生出特殊的方法,进行诠释。本书的两篇论文:金文京《试论日韩两国翻译中国典籍的方法》和木田章义《日本における漢文訓読の歴史》(日本汉文训读史)讨论了“训读法”,

直接涉及汉籍文献在跨文化传播时源出于语言歧异而产生的译解问题,此一问题,康达维教授在其论文中已就中西转译的各种复杂性作出分析。这两篇论文则讨论了中、日、韩语言转译的复杂性,与康教授的各个论点遥相呼应。这在我们所关怀的主题之中,显得别具深意。

金文京的论文介绍日韩两国为了阅读汉籍所发展出的“训读”,亦即以本国语言来诠释中国文言文的方法。而木田章义的论文则主要论述日本汉语训读的历史发展,并点出这种方法是日本吸收外来文化而消化为自身文化的一个典型。首先,作者认为训读的方式,是先经过解读,把中国典籍完全解构,再用自己的文化语言框架来重新架构。韩国位处中日之间,较日本早一步接受中国典籍,也较早发展出训读法。汉语与日、韩语的语言系统不同,文法语序迥异,训读法便因此而生。日人所谓的训读,包括字音和语序两方面,语音方面,或用日语固有语言读汉字。标音的方法,则仍用汉字标音。若直接读为中国音的读法,则称为“音读”。至于语序的训读,中文与日文的语序不同,最明显的是动词和宾语的次序。作者也追溯训读的源流,认为是起源于华严宗、三论宗、法相宗等的早期佛教宗派僧院。由于各宗派对佛经的不同诠释以及宗派传承时保密的需要,乃产生各种不同的方式。韩国接受中国文化比日本早,语言基本上跟日语属同系统。古代韩国亦使用类似日本的训读法,显示日文的训读法可能就是由韩国传过去的。若从广义的训读来观察,从中国周围民族中看到的训读现象相当广泛。总的来说,作者认为日韩两国为阅读中国典籍造出多种记号和繁复严密的训读架构,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木田章义的论文指出,根据日本8世纪的文献记载,当时就已确立了将汉字、汉文转换为日语书写的方法。大致而言,利用汉字和利用音假名各有优劣。学者于是从佛教界领悟了新方法,即把汉文用日语的阅读顺序抄写下来,也就是“返读”的方法。如此,则汉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变换成日文,并能为日本人所理解。这种被改装成日语的汉文通常被称作“训读文”。具而言之,汉文训读就是用古文文体读汉文。这虽与当时的日本口语文体迥异,但训读文仍能被现代的日本人所理解,令人惊异。另一方面,日本人想

出返读(颠倒句中的主述词顺序)汉文的方法,使汉文可做日文读,而且让读法精致化,最后所确立的训读文形式,也能运用于日语表现之中,日语可自在表现的散文文体于焉诞生。这也可见训读文积极影响的一面。作者根据训读文形成的历程,进一步论证日本接收外来文化的模式,认为日本文化一方面输入中国文化,受其影响,一方面仍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将外来和自身的文化交互融摄。“训读”可说是体现了日本式的文化接受型态。

事实证明,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语言和文献型态的各种繁复的问题,就贸然奢谈东亚经典诠释理论,往往会陷入危险而不自知。上述两篇论文,具体地说明了“语文分析”与“经典诠释”之间的重大关系。其中所举的各个例子,以及针对“训读”在东亚经典诠释史上深远影响所作的分析,都值得我们深思。而个人自去年起在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推动“语言文献分析与东亚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中心核心计划)的动机,亦是希望在这个课题上,作出更深入的探讨。

六

以上讨论的三个问题,各篇作者都从专业的角度,作出非常深入的剖析。然而,关于东亚传世汉籍文献的译解问题,个人认为还有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探究。以下分别提出一些思考。

首先,从文献注解的型态与性质问题进一步思考,还有两个问题是必须注意的。第一个是注解内容的整体性问题。东亚儒学传统中,最重要的学者大多穷毕生之力,将自身的思想寄托在对一两部经典的批注之中。然而,批注内容必然是随文(经典本文)见义,亦即说注文是散落在原典各个语句、段落、章节之下,而无法成为一篇首尾完足的论述。然而注经者思想的系统性与连贯性,却不应因此而被视为一堆散乱而彼此无关的片断。因此,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受到著作结构限制的注解文献,找寻其中内容的通贯性,以便重新建构作者的思想。另一个问题则是经典注释的范式

问题。当古人诠释一部经典时,可以采用的注经模式虽然很多,但就其方法取向而言,其实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对某一部经典的某一种注解的体系(整体内容)与思想(意识型态)特别加以发明、承继。这一类模式,我姑且称之为“溯源”的方法,这种模式的方法论背景,主要是认为一种旧的注解,本身具有独立的思想架构,有一套完整的诠释体系,后继者有责任去全部承继或发明旧注自成体系的内容。西汉经师受到师法、家法的制约,章句训诂率由旧说,就是这一类注经模式的体现。另一种是将许多种旧注打散,不去理会各种经注的思想体系异同问题,只依照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判断,作出选择。这一类模式,我称之为“集解”的方法。其方法论的背景,则是认为不必理会每一种旧注解体系的整体性,而只是从众多的经注中,选取撰著者认为合理的部分,对经典原文加以解释即可。这两种注经模式,各有优缺点。前者的优点是保留了某一系统的注经思想的纯粹性,缺点是墨守师说,不问是非;后者的优点是去短集长,缺点则是导致不同系统的经说与思想全部混淆。这种优劣互见的情况,究竟如何影响传统经典诠释工作的发展,我们未来又应如何选取适当的注经方式,这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思。

其次,从文献诠释的思维与方法问题进一步思考,个人认为文献结构与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尚可作更深入的探讨。以汉学家与理学家注经的不同方式而论,一般的理解,汉学家比较倾向“我注《六经》”,而理学家则比较倾向“《六经》注我”。前者突显了对经典传统的客观继承,后者则突显了诠释者主观意志的发扬。从一方面说,这显示了东亚经典诠释的两条途径,两者在经典传统中都各有特性和贡献,也自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从另一方面说,两者并不是无法融通地处于相反方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戴震(东原、慎修,1723—1777)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博引各种儒家经典文献,忠实地阐释《孟子》书中的观念字,可谓典型的“我注《六经》”。但在客观分析的内容之后,戴震也对每个观念字加以义理的发挥,并作思想上的批判,内容充满个人玄思的理趣,又可谓“《六经》注我”。戴氏的个案足以提醒我们,用简单的二分法去区分不同时期的文献诠释者,有时也难免有若干限制。

再者,从文献译注的语言制约问题进一步思考,就东亚儒学而言,以汉

字书写的儒家经典传至日本和韩国,日本儒者和韩国儒者亦多以汉字诠释经典。训读之法,证明了日、韩儒者设法尽量体贴经典中的汉语结构,同时又尽量融通两种语言的努力。这显示了东亚语言歧异的约束,反而引导出积极的影响力。然而,从另一个语言以外的角度看,像韩国儒者受到北宋以降中国儒者擅用“图象诠释”的方法诠释《周易》的影响,将这种方法加以转移,用来诠释诸如理、气、诚、命、四端、七情等儒学概念。而且这一类文献,普遍见于韩儒解释《周易》、《四书》、《尚书》等文献。这种跨文化的学术方法传播的特殊情形,不但受语言制约,而且是不折不扣的“超越”语言制约,其结果是造就了韩国儒学史上大批图象诠释的文献材料。经典诠释理论的“语言”与“超语言”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探索。

七

东方的传统,知识分子一般比较不喜欢将理论从经典诠释工作中抽离出来,单独申论分析。而有些学者尤其是文学家,甚至摆脱了一板一眼的注疏型态,运用“创作”的方式来体现对旧经典的“诠释”工作。如杜甫所作的诗歌,就有不少是全篇囊括六朝至唐代文学家的诗赋^①。这些综合而繁复的情况,都使得当今的研究者不容易掌握传统文献注译和诠释的理论体系。此外,古文辞的结构,诸如“盖……也”之类的古文句法,以及传统的思维方式,如“圣人必如是”或“圣人必不如是”之类常常被注经者所用的论述,从某些方面来看,都有过于笼统、不够清楚的毛病,使深藏在经典文献之内的方

① 陈寅恪曾在《读哀江南赋》一文指出,杜甫《咏怀古迹》诗囊括庾信《哀江南赋》而成篇,“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264-265)。笔者亦曾在《中国经典诠释的三个核心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全球化下的中华文化发展研讨会”论文,香港,2002年6月22日)指出杜甫《解闷》诗第九至十二首为囊括张九龄《荔枝赋》而成。我用“囊括”一词,指的是杜甫运用新的文体(近体诗)一面综合另一篇作品的全部意旨,撷其菁华,以新的笔法改写,同时又将自己的身世感慨灌注到作品之中,而产生出一种古典与今典“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用陈寅恪语)。这种手法其实也是“诠释”方法的一种。作者无异于重新疏解了一种旧文献的文意,而又以“我注《六经》”的方法注入自己的思想。

法论和理论思维,更加隐而不彰。北宋释惠洪(1071—1128)《石门文字禅》曾有“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二语。姑勿论这两句话能否被直接解释为传统学者动机上的“藏私”,但它的确很生动地反映了东亚地区形形色色的经典文献,所共同蕴涵的神秘的特质——立说者往往只向读者呈现一个圆融的成果或制成品,而将形成该制成品的心路历程和背景,深深隐藏起来。在这种神秘特质的背后,有形的文献体制和无形的精神世界之间,时显时隐,常常很难究诘。两种在体例上、结构上截然不同的经典注译著作,可能含有相同的内涵与精神。相反地,外观上看似相同的两部著作,也可能在思维与背景上截然不同。或许这也是导致康教授所说的“危险”(peril)和“乐趣”(pleasure)的原因吧。

东亚传世汉籍注译文献的神秘特质,和欧洲源出于《圣经》之诠释的诠释学的基本特质,究竟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固然是本文暂时无法回答的复杂问题。我们亦不应预设某一种心态,总想先找出“异”于西方之处或者“同”于西方之处,因为这一类的心态很容易虚构出不必要的偏见。然而,无论如何,身处在东亚文献传统之中,我们实不宜忽略文献注译各个层面的繁复性,更应该不断深入发掘更多有价值的资源和问题。我相信,东亚地区各国均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造成对经典产生不同的诠释方法、技术与理念。如何透过比较和研究,在翻译、解释文献的方法上,促进东亚地区不同学术传统之交流与分享,正是我们推动这一类学术活动,包括编辑这部书时,所怀抱的最大愿望。

2004年6月28日识于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目 录

导言.....	郑吉雄	1
---------	-----	---

The Perils and Pleasures of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康达维 David R. Knechtges	1
----------------	------------------------	---

文献批注的型态与性质

从温词《归国遥》“小凤战篦金飏艳”句五家注的讨论谈到

注解的态度与方法问题	张以仁	41
一、前言		41
二、五家六说——从华连圃到顾农		43
三、资料的筛理与重点的提出		45
四、分项讨论		47
五、训解小结		52
六、结语		54
七、尾声		57

“评点”的解释类型——从儒者标抹读经到经书评点的

侧面考察	张素卿	59
一、引言：何谓“评点”		59